

论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

傅荣校¹, 骆晓亦²

(1. 浙江大学 历史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2. 浙江大学 国际文化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要] 从传统鉴定理论模式研究, 到谢伦伯格的双重价值鉴定理论, 再到布姆斯的“社会分析和职能鉴定论”, 以及加拿大的“新宏观鉴定接收战略”, 直至目前广泛关注的以电子文件鉴定为中心的“职能与技术鉴定双重点”, 是档案鉴定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 呈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来源原则在档案鉴定领域得到应用, 档案学的两大特色理论交互发展; 二是传统史学理论及思潮的影响及渗透逐渐减少, 档案鉴定标准越来越社会化; 三是鉴定标准日趋实用化, 鉴定的实用主义功能目标反映越来越明显。

[关键词] 档案价值; 鉴定理论; 发展

[中图分类号] G27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3)06-0125-08

档案鉴定理论是档案工作发展到近代的产物。然而, 它较之任何一种档案学理论, 更表现出一种无与伦比的与时俱进的时代特点, 文件与档案管理的全部特征都在鉴定理论中得到了相应的反映。因而从纵向概括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 可以整体、宏观地把握档案工作的发展规律。

—

档案价值鉴定与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的产生并不同步, 它是文件管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世界范围看, 1789年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档案工作资本主义改革后, 才开始了有意识的档案价值鉴定工作。而档案价值鉴定理论, 则是在进入20世纪后, 随着档案工作的发展, 特别是文件数量的增长, 才得以形成并快速发展。1898年, 荷兰三位档案学者斐斯、缪勒和福罗英出版了著名的《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 其中阐述的思想已成为20世纪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但是, 手册只着重论述了档案的整理与编目, 几乎没有涉及我们现在所谈的术语——鉴定与选择。这个任务由后来的档案学家承担下来并陆续完成了。从进程上看, 现代档案鉴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 传统鉴定理论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

20世纪50年代以前这一时期, 对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的形成具有突出贡献的是普鲁士的迈斯奈尔和波兰的卡林斯基, 是他们奠定了传统鉴定理论。另外, 英国的希拉里·詹金逊的鉴定理论是这一时期另一流派的观点, 并在整个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位置。

1901年, 迈斯奈尔提出的一套鉴定标准, 首次把档案的价值鉴定上升到理论高度, 奠定了鉴定

[收稿日期] 2003-01-06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0CTQ002)

[作者简介] 1. 傅荣校(1965-), 男, 浙江桐庐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档案学、办公自动化、社会信息化研究。2. 骆晓亦(1981-), 女, 浙江义乌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国际文化学系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万方数据

理论形成的基础。虽然用现在的目光评价迈斯奈尔的鉴定系统不够严密,但是其中的两条标准我们沿用至今:一是他提出了“高龄案卷应当受到尊重”的著名论断,被称作年龄鉴定论,主张每一个国家应设置一个禁销档案的“界限年份”,这在世界档案界有广泛的影响,它揭示了档案作为一种证据性材料所固有的历史价值,改变了过去注重档案行政参考价值的片面作法,从而避免了大量珍贵古老档案的毁弃。二是他认为不能把案卷作为零碎的材料孤立地分别单独评判,而应该以它们固有的行政关系为具体背景进行鉴定,即在鉴定时,应该考虑各行政单位在政府机构中所处的地位,其活动性质,以及这种活动与上下级行政单位活动的关系,由此看来,这第二条标准是以来源原则为基础的,它对建立正确的鉴定理论贡献尤其重大。迈斯奈尔的鉴定理论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它使欧美各国的档案价值鉴定工作开始摆脱纯经验操作阶段,初步有了鉴定理念的指导。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波兰档案学家卡林斯基又将档案鉴定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卡林斯基接受并发展了迈斯奈尔鉴定理论这已蕴含了职能鉴定的重要思想,提出了更具操作性的鉴定理论和标准,其理论核心是“职能鉴定论”,即档案文件的价值取决于产生机关的职能及其在政府机关体系中的等级地位。按照这一理论,高级机关和职能重要的机关形成的文件价值大于低级机关或职能不重要的机关形成的文件。“职能鉴定论”使鉴定工作由过去被动销毁档案转到了主动按档案价值决定留存上来,这是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突出的意义。

当然,迈斯奈尔和卡林斯基对文件自身价值的描述是粗线条的,他们侧重从文件的形成环境而非文件的内容属性来确定文件的存留,还没有充分权衡文件自身属性与文件形成主体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个问题后来在美国档案学家谢伦伯格那里才初步得到了解决。

另外,英国档案学家希拉里·詹金逊也在这一时期提出了自己的鉴定理论,他于1922年出版了档案理论与实践的一部重要著作《档案管理手册》(A Manual of Archive Administration)。他提出的档案作为公正证据的道德捍卫,档案人员是证据保护者的观点,已成为档案专业“嘹亮的号角”。詹金逊坚持认为档案是由文件形成者产生的一个文件有机整体,从该整体中抽取任何一份文件都违背了档案基本原则。他提出“销毁文件不是档案人员的正常业务,档案人员无须干预如何去文件。”^[1]当然,这一理论与迈斯奈尔和卡林斯基主张的“积极挑选有价值的文件”的观点形成对立。另外,由于詹金逊原则上反对档案人员参与档案的鉴定,认为只有行政人员才能作为鉴定文件的主体,因而,他被视为古典档案学派的人物。

(二)双重价值鉴定理论(20世纪50-80年代)

这一时期,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继续发展,突出的代表是谢伦伯格的档案双重价值鉴定理论。谢伦伯格以其卓越的档案价值理论否定了詹金逊的档案鉴定思想,提出了鉴定标准,进一步发展了卡林斯基的“职能鉴定论”思想,但更为重要的是,谢伦伯格开始对文件形成和利用主体与文件自身属性之间的矛盾关系作了事实上较为细微的研究,对文件价值作了较全面的阐述,并因此成为“美国档案鉴定理论之父”。

20世纪50年代,谢伦伯格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套鉴定标准,首次对档案价值作了较全面的阐述。他明确区分了文件的两种价值,即对原始机关的第一价值(初始价值)和对其他机关及非政府方面使用者的第二价值(从属价值)。其中,第一价值包括行政管理价值、法律价值、财务价值和执行价值,第二价值称之为档案价值,其又分为证据价值和情报价值两种类型,并阐述了鉴定这两方面价值的原则和方法。谢伦伯格的理论超越了只从机关角度考查档案价值的狭隘观念,从而使档案工作者能够从分析档案文件内容、分析利用者需求的角度出发,全面、历史地考查档案价值。此外,谢伦伯格还强调鉴定时应考虑档案保管费用、技术条件、场地限制。这种效益的观点后来发展成为档案价值鉴定中的一个重要参照因素。

20世纪60、70年代,欧美档案学的理论仍沿着谢伦伯格的观点继续发展。较有影响的是美国档案学者布里奇福特1975年所著的《档案与手稿的鉴定和接收》^{[2] p.5}。他把谢伦伯格的框架和之后21年中的经验结合起来,提供了一个概念和实际工作的详尽纲要,然而,虽然他提出的鉴定尺度单子及其说明很有价值,但他没有把它们综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档案学者博尔斯和朱莉娅·扬提出的一个由三个模块组成的鉴定决策模型。他们认为,谢伦伯格要求档案工作者首先考虑文件的证据价值,然后再考虑文件的情报价值,这种观点反映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对法律的优先考虑。而这种优先考虑,在许多非国家档案馆,如大学档案馆、机关档案馆中就不能完全适用。为此,他们认为必须有一种对于不同背景的档案机构完全适用的鉴定模式。他们提出的鉴定模式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模块:“信息价值”、“保管费用”、“鉴定建议”^[3]。每一个模块包括若干成分,这种成分又包括若干要素,构成一个复杂的标准体系。较之谢伦伯格的理论,他们强调这三个模块及其内部成分、要素的相互联系。然而,博尔斯和朱莉娅·扬提出的“保管费用模块”难以确定,而“鉴定建议模块”则过于抽象,实际操作中差不多只有“信息价值模块”是实用的,这又回到了谢伦伯格的鉴定模式中去了。

由于谢伦伯格促使档案人员把关注的焦点从文件转移到其潜在用途上,特别是文件对于历史研究的用处,强调通过文件来反映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引导着有的学者越行越远,提出了“利用决定论”,强调“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的实际利用和预期利用”是档案鉴定的“最重要标准”。当时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的重要鉴定思想家米耶·菲斯拜甚至主张“编史工作的最新趋势是判断文件价值的首要标准”^{[4] p.151}。不过这种观点并没有在档案界达成共识,杰拉尔德·汉姆认为其最终结果是“档案馆藏只限于满足狭隘的研究需要,无法广泛地反映人类生活方方面面”,他进一步指出,“利用决定论”实际上破坏了文件在其形成者业务活动中形成的自然联系,完全忽视了形成者的延续机构记忆的需要。谢伦伯格的双重价值理论对欧美档案鉴定工作影响巨大,欧美国家普遍建立起来的双重价值鉴定机制,就源于他的理论模式,并至目前尚富有现实成效。

(三)新职能鉴定理论时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件数量的惊人增长、文件类型的日益复杂,以及社会对档案利用范围的扩大,给鉴定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许多档案学者和档案工作者对鉴定的新理论、新方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由此,档案鉴定理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这一时期,世界各国的档案研究人员逐步坚信档案应当反映其产生的社会,档案应该“广泛地反映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通公民看来,由纳税人资金建立起来的档案馆应该是属于全社会的,所以,“档案不仅要涉及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的个人权益,而且更多的还应该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体记忆。”^{[4] p.151}档案理论的思想基础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即从一个国家的理论发展到一种全社会的理论。这就促使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社会分析和职能鉴定论”在此背景下得以全面发展和论证。

“社会分析和职能鉴定论”最初源于德国档案学家汉斯·布姆斯的“以文件形成者职能体现社会价值”思想。布姆斯认为,社会应确定其自身价值,档案文件必须如实地反映这些价值。社会价值最好不是直接通过对社会动力和公共舆论的研究来确定,而应间接地通过了解那些为实现社会需求和愿望的重要文件形成者的职能来判断。按照这种方法,对文件的评判标准从复杂的社会价值、问题或趋势转变为由文件形成者职能显示出的文件来源。当然,这是一种广义的来源,其分析的重点将是文件形成者的职能、计划,所参与进行的活动及活动中的有机联系和业务的重要性。具体来说,分析哪些职能活动、哪些工作更重要,从而将在其中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文件都保存下来,而不再逐份审阅文件本身。这是对卡林斯基“职能鉴定论”的发展。

万方数据

布姆斯的观点与加拿大国家档案馆1989年后实行的“新宏观鉴定接收战略”相吻合。加拿大的鉴定方法首先关注的是机构活动的有机联系,其次是分析和鉴定政府职能、计划、活动和业务的重要性。因此,鉴定的着眼点不是集中在文件或单份文件上,而是集中在生成文件的政府职能、任务和活动上。这一做法为鉴定大批量的文件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法,尤其此时大量出现的电子文件。

加拿大学者T·库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的研究也与此档案鉴定的战略转移不谋而合。他一直主张档案鉴定方法应“置于一种以文件前后关系为基础,以来源为中心的框架之中,而不是置于以内容为基础的历史文献框架之中”。尤其是电子文件出现后,档案事业面临新的挑战,库克指出:“作为档案鉴定的核心——鉴定具有永久保存价值文件的过程需要改变,这是因为文件的传统概念和物质形态不复存在,需要鉴定的文件数量过大,而这种鉴定往往必须在一份文件产生之前在计算机系统阶段完成。鉴定将因此侧重职能、业务和风险分析,而非文件及其潜在价值。”

[4] p.153)

由于这一时期的档案鉴定理论,又以机关的职能为支点开展研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卡林斯基的“职能鉴定论”,因而,为区别前者,一般把这一时期的职能鉴定研究,加一个“新”字为其前缀,称之为“新职能鉴定理论”。

(四) 电子文件的内容鉴定与技术鉴定双重支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

对于电子文件的鉴定模式的探讨,差不多跟“社会分析和职能鉴定论”的探讨同步,而且到特里·库克的“新职能”思想,两者几乎走入了同一轨道。因为电子文件“转瞬即逝”,必须在文件形成之前就决定其未来是否需要“存盘”,存活多久;另外,电子文件数量特别大,不可能对电子文件“逐份审阅”。因而,新职能鉴定法的按文件形成职能鉴定的原则和“批处理”方式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然而,电子文件对传统档案模式带来的最大冲击,并不在于对职能思想的适应上,而在于鉴定电子文件标准模式上,为此,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双重鉴定支点:即职能鉴定与技术鉴定标准的双重应用。

法国档案学者哈罗德·瑙格勒(Harold Naugler)1984年在其研究报告《机读文件的鉴定》中,就深入分析电子文件鉴定与传统文件鉴定的差异,首次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电子文件双重鉴定的思想。他认为“机读文件的鉴定包括文件所含信息的鉴定(内容鉴定)和文件技术状况的鉴定(技术分析)”[5] p.37。这一思想在实践上为电子文件的鉴定工作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在理论上为鉴定电子文件的保存价值建立了两个支点——内容的有用性和技术状况,从而引起了各国档案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人员的极大关注,这一点在1997年国际档案理事会的《电子文件管理指南》也反映出来了。我国档案学者冯惠玲教授在1998年也指出了电子文件内容鉴定与技术双重鉴定的模式与特点[6]。

在第一个支点——电子文件内容鉴定方面的研究上,目前国际档案界有关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方法,另一种是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德国等国的方法。美国的做法反映了美国档案界和史学界的历史联系,以及档案价值对于学者的潜在性。相反,以加拿大国家档案馆为代表的所谓“职能鉴定学派”根据职能对档案进行鉴定,它采用从上到下的方法,先对政府重要职能进行鉴定,然后再对这些职能产生的文件的行政和文献联系进行分析,最后对最能满足证据要求的文件进行选择。

在第二支点——电子文件的技术研究,各国电子文件管理部门与档案界表示出基本一致的看法。提出双重鉴定思想的瑙格勒认为,技术鉴定是电子文件鉴定中新的部分,它是比内容鉴定更为重要的部分。技术鉴定所承担的责任是对电子文件的各方面技术状况进行全面的检查,包括对电子文件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可读性的认定和对电子文件有无病毒检测与载体状况的检测。

万方数据

电子文件的双支点(尤其是技术鉴定这一支点)极大地拓宽了档案鉴定理论研究的领域,使得研究人员改变了以往仅仅专注于档案自身属性与社会需要这两个方面寻找鉴定标准的习惯,从而给档案鉴定理论增加了新的发展动力源。

二

通过对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的历史回顾,我们不难发现档案鉴定理论发展史中所呈现的特点和规律,研究这些规律,将有助于我们更透彻地理解档案鉴定理论,并为探索新的理论模式奠定基础。

(一)来源原则与档案鉴定理论交互影响,共同发展

来源原则,即“按照文件的形成机构划分和管理档案”,它起源于1841年法国提出的“尊重全宗原则”,百余年来,历久弥新,其应用价值日益拓宽。它反映到档案价值领域,就是依据档案形成者及其职能鉴定档案的保存价值^[7]。

从档案鉴定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趋势来看,来源原则的指导作用不容忽视。迈斯奈尔提出的鉴定体系中,第二条标准就是以来源原则为基础的。

来源原则也影响了谢伦伯格的理论。20世纪50年代,谢伦伯格在他的代表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中提出“公共文件具有对产生文件的原机构的原始价值,以及对于其他机构和非政府使用者的从属价值”,因而在判定文件价值时必须知道文件是怎样产生的,如果对文件“产生于什么样的政府行政单位或特定的来源不明,它的作用和意义也可能就难以确定。”^[8](p.153)这些论断体现了档案的来源特征对价值鉴定的影响,也是谢伦伯格对档案鉴定理论的新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分析和职能鉴定论与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新宏观鉴定接收战略”更是充分体现了来源原则对传统鉴定理论和方法的改革,这可从库克的报告中窥见一斑。1991年,汉斯·布姆斯指出“档案人员需要对文件形成者职能进行有效分析,以便将利用需求与文件自身联系起来。”认为按照这种方法,就会出现一种“迅速转变”,即从复杂的社会价值、问题与趋势转变为由文件形成者职能显示出的文件来源,并进一步指明:这就是为什么来源必须是档案鉴定永恒的基本原则的原因所在。^[4](p.153)而特里·库克在1996年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报告中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档案理论与实践,提出“新来源观”和“新宏观鉴定”。由库克的报告看出,基于“档案价值取决于社会结构,通过社会职能体现出来的‘新来源观’”,欧美各国先后把鉴定的重点“从文件实体转向文件的形成过程”。

当然,来源鉴定的标准和方法比较客观,简捷实用,是研究判断档案价值的重要依据,却不是唯一标准,不应该排斥其他的鉴定标准和方法。档案价值鉴定是档案学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颇为复杂的难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在坚持以档案来源特征为标准同时,还要结合其内容和形式等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以全面、准确地甄别和判断档案的保存价值。

(二)传统史学理论及思潮的影响及渗透逐渐减少,档案鉴定标准趋向社会化

18世纪以来,流传于西欧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思潮,严重影响了档案人员对文件开展鉴定的行为。如19世纪最有影响的德国历史学家冯·兰克,就宣称“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就怎样叙述”,认为“当事人的信函比史学家的记录更有价值”。当时的档案工作者认为:他们的职责只是“为国家和民族乃至社会文明保存史料,积累知识,因而认为鉴定档案是对历史的亵渎和冒犯,原则上反对一切鉴定和销毁档案的行为。”^[9](p.247)在档案鉴定问题上表现出极端的保守性和片面性。

希拉里·詹金逊最初也是坚决反对鉴定,其思想突出的特征是“档案‘证据的神圣性不可侵犯’”。
万方数据

对此,加拿大的库克批评他执著坚持的是一种“狭隘的证据性特点”。后来,由于社会性文件产生了数量庞大的文件,导致鉴定工作不得不开展,这时,詹金逊做出了一些让步,提出“让行政官员成为选留和销毁其文件的惟一代理人……”尽管他仍过分地强调档案的证据性,反对档案人员参加鉴定和挑选文件。

诚然,詹金逊关于档案的证据价值和必须维护档案证据价值的思想是可贵的,但是,他到了极端。詹金逊过分地强调事物的一个方面,却忽略了事物的另一方面,即被他当作选留和销毁文件惟一代理人的行政官员,并不能确保文件证据的神圣性不可侵犯,他们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过多或过少地销毁文件;甚至为历史研究和提供活动证据而刻意编制文件”。由于在理论上的片面性,他无法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法。詹金逊的鉴定思想把本来合理的东西绝对化、片面化,这就把科学转化为谬误。

谢伦伯格以其卓越的双重价值鉴定理论否定了詹金逊的档案鉴定思想,为档案价值鉴定理论与实践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把关注焦点放到了史学研究需要之上,他的后继者甚至越行越远,提倡决定档案根本性质的应当是从属价值。

当然,无论是迈斯奈尔和卡林斯基时代的职能鉴定论,还是谢伦伯格的双重价值鉴定理论,都是从文件的自身属性出发来判断其保存价值,两者只是在文件自身属性的着眼点和侧重点上存在不同。职能鉴定论作为先期出现的档案鉴定理论,侧重于从文件、档案的形成者及其职能地位的重要程度,也就是从文件、档案的外部特征来评定文件、档案的价值;而双重鉴定理论则着眼于从文件、档案的内容属性,从文件、档案内容所具有的原始价值和从属价值大小来进行鉴定。

社会分析和职能鉴定法之所以在能够当今大放异彩,原因在于布姆斯把社会需要分析和职能鉴定,落地生根,定位到文件形成者的活动上。这种鉴定法根据文件客体属性和人们对文件的主体需求两种要素作出价值判断,成功地将主体需求与客观属性相融。首先,文件客体属性是社会职能活动赋予的。文件自身的客体属性,无论是内容、形成者来源,还是时间、形式等特征,基本上是由这种职能活动赋予的,或是由这种活动造成的。透过形成文件的职能活动,就能反映或者体现文件的客体属性。其次,人们的主体需求塑造了社会职能活动。人们的社会主体需求和愿望是通过特定的社会职能活动实现的,因而通过分析各种社会职能活动就可以间接地体现人们的主体需求和愿望。因而,只要文件能完整地反映特定的社会职能活动,就能满足特定的社会主体的利用需要。

综上所述,社会分析和职能鉴定法能对文件的客体属性和人们的主体需求及两者间的矛盾运动的具体体现——文件价值做出基本上客观的判定。社会分析和职能鉴定这种鉴定体系无疑比卡林斯基的职能鉴定论进步多了。

在最后一个古典档案学者——希拉里·詹金逊的理论影响日趋式微后,档案鉴定理论研究基本上脱离史学思潮的影响,不再受历史学家思想观点的挤压。而在电子文件出现之后,技术鉴定的难度与受关注程度超过了对内容的审视,电子文件鉴定的双重支点的建立,完全宣告历史主义色彩的淡化,现实需要以及技术性属性越来越成为鉴定理论研究的重点了。

(三) 鉴定标准日趋实用化 鉴定的实用主义功能目标反映越来越明显

虽然档案鉴定理论体系在把握主体需求和客体属性这对价值关系方面日趋成熟和全面,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文件、档案鉴定动机更趋“实用化”,鉴定理论体系开始突破主体需求和客体属性这两方面依据的限制,呈现出一种全面的、发展的趋势。

审视整个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历史,这种“实用化”的趋势可以从两方面体现出来。第一,鉴定标准向更利于实际操作程序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愈是早的鉴定体系,其标准愈是抽象,鉴定人员难以把握。迈斯奈尔的鉴定标准虽然使档案鉴定工作开始摆脱纯经验操作阶段,但是标准过于粗糙,从万方数据

某种程度上说只是一种鉴定理念。卡林斯基的职能鉴定标准继承和发展了迈斯奈尔的鉴定思想,而且更具操作性,但是没有具体的文件处置一览表,更谈不上文件保管年份的细分,因此具体操作时鉴定者还是难以掌握。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情形在很多国家得到了改变,这主要是因为文件数量急剧增长,鉴定行为需要当机立断,而不是在模棱两可的标准下犹豫不决,举棋不定。这些国家就通过反复的验证,制定出指导文件鉴定的文件处置一览表,把文件的保管年份进一步细致化,以便于鉴定人员在具体操作时掌握。比如美国、加拿大等国,他们机械式的鉴定标准,大大改变了以往鉴定工作滞后的局面。第二,效益标准渐渐得到重视,成为鉴定中奉行的一条原则。早在1946年美国档案学者波尔就提出把保存的费用作为档案鉴定的要素之一,但这种讲究实用的观点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甚至遭到了一些档案人员的批评,这一标准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到广泛倡导。谢伦伯格在对档案价值作较全面的阐述时,还强调鉴定时应考虑档案保管费用、技术条件、场地限制等。他认为,任何一份档案都可能在某个时候、某个场合发生作用。但不可能把他们全部保存,社会用于保管的能力毕竟有限,这样就必须考虑到经费问题。布里奇福特在《档案与手稿 鉴定和登记》中更明确地提出了这条标准。他强调,档案鉴定应充分考虑存储、保存、处置文件费用等因素。他引用菲利普·鲍尔的话,认为:“一种严格而实在的费用核算是所有例行鉴定工作的一个必要条件。”〔2〕p.23 博尔斯和朱莉娅·扬提出的鉴定模式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模块,其中一个模块便是保管费用。美国的弗兰克·博尔斯和朱莉娅在1985年第二期《美国档案工作者》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保管费用是档案鉴定标准之一。不仅仅是美国,从目前看来,效益标准已经作为一种非文件价值关系因素的鉴定标准,而被各种鉴定体系广泛采用,我国许多论著中也采用了这一标准。世界各国档案工作者都在考虑档案发挥作用所带来的效益与保存价值所付出的代价问题的对比关系,尽可能将能够发挥作用带来的效益大于其保存代价。这说明讲究实用化的鉴定体系已被广泛接纳,人们在鉴定文件、档案价值时,已不再局限于从主体需求和客体属性两方面寻求依据了。

综上所述,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规律性的过程,档案工作者要以发展、全面的眼光看待档案鉴定理论的每一次变化,价值鉴定工作与整个文件和档案管理密切相关,正确地把握鉴定标准,进而跟其他管理环节相联系,这也是现代(尤其是电子时代)档案工作发展的客观要求。

[参 考 文 献]

- [1] 吴江华. 中外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的形成及其研究现状[J]. 档案, 2001(1): 33-35.
- [2] 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 档案工作理论与方法[M].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8.
- [3] 弗兰克·博尔斯, 朱莉娅·扬. 探索黑箱——大学行政管理文件的鉴定[J]. 档案学通讯, 1988(6): 64-69.
- [4] 特里·库克. 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A]. 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C].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7.
- [5] Harold Naugler. The Archival Appraisal of machine records, a RAMP study with guidelines[R]. General Information Programme and UMISIST, 1984.
- [6] 冯惠玲. 电子文件的双重鉴定[J]. 档案学通讯, 1998(3): 33-36.
- [7] 晋平. 档案价值鉴定的来源原则及其应用[J]. 档案学通讯, 2000(2): 42-45.
- [8] 谢伦伯格. 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M].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3.
- [9] 何嘉荪, 傅荣校. 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M].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 曾建林]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val Appraisal Theory

FU Rong-xiao¹, LUO Xiao-yi²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2.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As a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ves management in modern times, archival appraisal theory gradually shows all its operational features in records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As time goes on, we can see that archival appraisal theory is clearly superior to any other archival theory.

There are four phas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val appraisal theory sinc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first phase is called traditional appraisal theory period before 1950's, including Ages Appraisal System and Functional Appraisal Theory. However, Hilary Jenkinson, the British classical archival scholar, exerted a tremendous influence over other archivists during this period. He published his famous book entitled *A Manual for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Jenkinson opposed archives appraisal act in which archivists joined.

Since 1950's, records are voluminous. Their growth in volume corresponded closely to the increase in social activities.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scholars focused on the reduction in the quantity records. The appraisal theory then entered the second stage: the period of Double Values Appraisal theory presented by Theodore R. Schellenberg who has been called respectfully "the father of appraisal the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 landmark book, *Modern Archives: Principle and Technique*, he asserted that records had Primary Value and Secondary Value. The former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of records to their original creator and the latter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of records on subsequent researchers. Double Values Appraisal theory became the basic appraisal mechanism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third phase was the new functional appraisal theories, the German "Society Analysis and Functional Appraisal" represented by Hans Booms, and the "New Macro-appraisal Acquisition Strategy" which has been used by the Canadian National Archives since 1989. Both of them claim that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among agency's activities ought to be noticed and that the importance of governmental functions, programs, activities, and businesses should be analyzed and appraised. The Canadian scholar Terry Cook concluded their commonality in the thirteenth international archival congress. He held that the appraisal methodology should be a context-based, provenance-centered framework rather than a content-based historical-documentalist one.

The fourth is electronic records appraisal theory, which suggests the establishment of double fulcrum that is essential in appraising electronic records: one reflects content appraisal while the other is technological appraisal. It appeared first in French Harold Naugler's Research Report, "The Archival Appraisal of Machine-readable Records: a RAMP Study with Guidelines." As a new focal point, the technological analysis emphasizes appraisal of the authenticity, integrity, usability and readability of electronic records. It also needs to kill viruses and check the media of record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ppraisal theory, some features have appeared. First, the principle of provenance and the archives appraisal theory impact each other. Secondly, influences of traditional history studies on appraisal theories have faded since 1950's; Thirdly, the appraisal criteria or guidelines show trends of usability and practicality. The coloring of pragmatism is getting clear than ever before.

Key words: archival value; appraisal theory; development

万方数据